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轉向：1980 年代後日本通產省官僚和產業政策的變遷(I)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41-001-
執行期間：98年08月01日至99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

計畫主持人：林文斌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良正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31 日

壹、前言

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由戰敗國的經濟窘迫，歷經十餘年的經濟重建，在 1960 年代一躍成為經濟成長快速的已發展國家，引起歐政學界的高度興趣。其中爭論的集點在於是什麼原因促成日本的經濟成就。其中兩大爭論陣營分別是主張自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及主張國家領導經濟成長的資本主義發展學派。雙方各有論據、旗鼓相當，使原本立場傾向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們，也不得不在 1993 年出版的《東亞經濟奇蹟：經濟成長與政策》中承認，日本的國家採取的低利率、出口導向和產業政策等經濟措施，是造成經濟快速發展奇蹟的眾多原因之一(World Bank 1993)。這使國家採取的經濟、產業政策受到高度的矚目。

Johnson(1982)在 1982 年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產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提出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論認為，日本通商產業省（通產省）採取眾多產業政策，是推動日本經濟成長奇蹟的幕後功臣，也認為日本政治其實是由官僚主導，而非其民主制度下的民選政治家來統治。但日本 1980 年代的泡沫經濟在 1990 年代初期破滅，長達十餘年的低度經濟成長，使日本國內外政學界討論所謂日本型的經濟結構是否已經「僵化」，不再符合當代全球整合的經濟互賴。日本政治經濟體制必須進行「構造改革」的論述，很快地成為主流意見。2001 年起的行政官廳改革，期望以強化民選政治家的權力來矯正「官僚統治日本」的負面印象。其中又以在 1990 年代被指責處置金融危機不力、爆發多起受賄醜聞的大藏省改名為財務省，失去金融行政和政策權力。

相對之下，過去被認為是經濟成長主要推動者的通產省，則不僅更名為經濟產業省（英文名為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在名義不僅擴大原有的通商貿易到負責全體經濟事務，在實際上也將原有的部分經濟企畫廳科室整併入轄下的經濟產業政策局（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licy Bureau）。經濟產業省在中央省廳調整後，人數不減反增，負責的功能也更為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通產省在 1990 年代積極推動構造改革，對日本經濟構造的立場和一般被認為抗拒改革的大藏省，大相徑庭。本研究探究通產省因何改變其政策態度並在日本的政經體制轉型中扮演何種角色，有助我們理解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及未來可能的方向。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目的是，探究在二次大戰後，形塑日本經濟奇蹟體制的通產省，(一)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開始認為自己參與建立的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無法維持日本的經濟發展，而有必要進行改革？(二)在此情況下，通產省官僚又做了什麼改革？如何推動改革？本計畫以通產省負責的產業政策為研究焦點，由產業政策想要達成的目標、執行手段，產業政策的決策和執行過程、產業政策實行的結果，採取比較個案的研究方法，探究通產省官僚和日本產業政策如何由發展主義轉向市場經濟主義，深入分析日本政經體制轉型中的官僚轉型層面。98 年度計畫蒐集並累積有關日本通產省的各種文獻研究，以及相關的官方文畫資料，建立理論分析架構，尤其著重在期望發現 1980-1990 年代，通產省產業政策受到來自自民黨政客、產業界團體力量的干預，以致於成果不彰，甚至被否決的失敗案例，以及成功的案例。有了相對照的案例，便可透過比較失敗案例和成功案例的差異，分析其間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環境因素，進而探索通產省官僚為何改變對日本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產生疑問，如何改採英美式的市場開放、自由化的措施。

參、文獻探討

自 Johnson(1982)名著之後，通產省雖被多數外國人注意到，但直接針對通產省及其產業政策的研究，卻未明顯增加，而是促進了美國學界對日本此種非市場自由主義經濟體的研究興趣。而在日本發

生經濟不景氣後，歐美和日本學者轉而探求日本政經體制中的僵化成分，分析危機的成因。當日本採取改革時，學者則觀察、討論這些改革對日本政經構造成變化。但直接以通產省作為研究標的，貫穿前述三個時期的研究卻不多。

首先，Johnson(1982)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論，政客基本上統而不治，執行治理功能的是政府官僚，尤其是以行政指導來實行市場干預和扶植產業的通產省。Okimoto(1989)則由 Johnson 的基礎出發指出，通產省並不全然利用直接的行政指導，其通常只有在產業發展之初和發生蕭條之時，會採取高度的介入政策，而在產業發展成熟時，任由產業自行發展。在此時，通產省則透過審議會和官員空降和產業界相互協調，形成所謂的「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Samuels 以此為基礎，但更進一步提出所謂的互惠性同意 (reciprocal consent)，指出日本通產官僚並不常直接干預市場，而是作為一個協調者，協調企業的合作以減少交易成本。三輪芳朗甚至認為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即使是在高度成長期，都沒有達成其效果，而是企業依市場原理而自行運作(三輪芳朗 and ラムザイヤ一, 2002; Miwa and Ramseyer, 2006)。然而這些的說法仍然是少數，大多數的美日學者仍然認為日本官僚對日本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促進功能(榊原英資、野口悠紀雄, 1977; 野口悠紀雄, 2002)。

不過，在爭辯產業政策是否是日本經濟發展推手時，1990 年代的「平成不況」，使政學界將矛頭指向日本長期保守的金融體制，若非日本銀行、大藏省政策失誤(Posen, 1998; Laurence, 2001; 2003)，就是金融體制有問題(宮崎義一, 1992; Katz, 1998, 2003; Hartcher, 1998; Gao, 2001; Lincoln, 2001; Amyx, 2003; 村松岐夫、奧野正寬, 2002)。而在一片要求政經改革呼聲中，被認為要大幅改革的主要是大藏省。大藏省負責金融管理，日本泡沫經濟發生及處理不善，難以卸責。然而在追究經濟衰退的元凶時，可以發現通產省很少被指責，甚至其還早已主動推動構造改革。例如 Tiberghien(2007)注意到通產省在 1993 年開始推動公司法改革，最後在 2005 成功將獨立董事制度列為公司法規定，進而影響日本公司治理制。然而，他的研究僅注意到政治家的政治行動，才能修法促使日本進行公司治理的重大改革。但其強調以如與謝野馨等民選政客為主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 在各種困難中的機會運作，而較少著墨通產省官僚的轉變。

由上的文獻考察顯示，1980 年代之後的通產省在日本政治經濟轉型中扮演的角色，顯然並未受到關注，反而認為政治家在推動構造改革上有許多的機會點 (即使稍縱即逝)。但我們又可以發現通產省早在 1970 年代便開始將強化市場置入其官方文件，在 1980 年代即由自己所能掌管的大規模小飯店法 (簡稱大店法)，開始推動管制自由化。一直到 1998 年才完會廢除大店法，改以大型店立地法管理。而在 1990 年代，通產省也推動公平交易法的改革，尤其是將被稱為公平交易法中的「憲法第九條」，禁止控股公司設立的條文廢除，使得日本企業集團真正完成集團內的資源整合，強化企業應變彈性，間接促作 2000 年之後的公司合併。而前述的公司法改革，也是由通產省在 1993 年即發起，經年累月最後才得以施行。由此可見，通產省在日本政治經濟改革中，處於一個鴨子滑水，少為人知，但卻是進行重要制度改革的幕後改革的推手。

肆、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一、理論基礎

本研究係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研究及分析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並將研究重心置於被譽為日本經濟奇蹟幕後推手的通產省官僚及其產業政策，在經濟體系已成熟，且遭受全球化經濟整合壓力的情況下，如何立場轉向、採取和以往不同類型的產業政策的過程。本研究以經濟網絡、交易成本及新制度理論、政治過程論、資本主義多樣性等四種政治經濟學中的理論為基礎，發展研究分析架構：

(一) 交易成本及新制度理論

由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為基礎而發展的新制度理論則認為，合作與協調的產生原因也可能

來自於相關行為者間的理性利計算。因為依據雙方合意的制制或規則行事，不僅是因為相互信任，更可能是因為制度能夠有效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而就日本通產省和產業間的關係而言，產業服從通產省的行政指導而形成卡特爾或合作研發，可能是因為通產省作為一個協調者，獨自負擔了企業間彼步協調合作的成本，也不同擔心合作者間會有背叛者，因為通產省會出面懲罪違反者。另言之，特定產業內的企業，在投資決策及融資來源上，都有通產省於其間分擔風險，使得產業內的合作與協調成為可能。因此，新制度主義關於交易成本、風險分擔的概念，可作為產業政策之發揮功能解釋原因。接下來便是要以特定案例的分析佐證。其次，日本的產業政策有時以正式法規出現，如「石油業法」、「特定產業構造改善臨時措置法」，但日本在 1990 年代行政程序法通過以前，許多的法律條文都相當言簡意賅，留給執法官廳相當多的保留權力。通產省的行政指導(administrative guidance)，便常常成為通產省單方面決定產業政策方向的指標工具，也具有在法規制度之外的特徵。但行政指導的成功必須依賴於被指導的民間企業自願性的合作，因為行政指導並無法律上的強制力(大山耕輔, 1996: 63; 蔡增家, 2007: 95)。我們可以據此發展探究，官方和特定產業就產業政策上的行政指導，是否達成官方政策目標，來分析官僚和產業間對政策方向和工具的傾向。其三，當行政指導成功率愈來愈低，法規條文愈來愈明確化時，便可據此認為產業政策日益偏向市場自由主義，因此官僚和企業間的關係已開始保持拒離。

(二) 經濟網絡分析

新制度主義的分析主要以正式法規、制度為研究標的，但日本傳統以來便是一個非常注重人際網絡的國家，因此，非正式網絡具有補充、甚至替代正式制度的情況。學者常認為網絡關係和政策決定、執行過程、甚至政策結果良窳有所關聯，因為網絡可以提供其間的行為者在決定如何彼此互動時的決策資訊，進而增進行為者間因長期的穩定關係，而可產生合作和協調，減少不確定性(Lincoln and Gerlach, 2004; Anchorogry, 2005)。在重視人際關係的日本，官僚和民間企業間的重要關係建立來源是所謂的「天下り」，意為「從天而下」或「下凡」，指官僚退休後至主管之民間企業任職的情況。「天下り」曾被認為有助於建立和維持官民良好關係，有利於雙方的瞭解和政策的推行(Usui, 2003)。但 1990 年代之後，由於官僚收受民間企業醜聞頻頻被揭露，政治人民和輿論抨擊官僚退休後到民間任職，為自己謀求後路，以致於放寬對企業監督管理的情況，「天下り」遂被視為是負面字眼(堤和馬, 2000)，也愈來愈被法律明確限制。網絡分析強調網絡關係的穩定，也可能使網絡間的共同文化，如產業政策上的發展主義傾向，隨之穩定。然而，在現實上又可觀察到通產省產業政策傾向在 1980 年代之後的轉變，因此，本研究可以比較 1980 年之前和之後，特定產業的政策網絡關係，如通產省之內、通產省和企業間，是否有所改變，例如在處理經營不善事業上，「天下り」在其中的影響，以及其間如何在產業政策傾向上由發展主義轉變為市場經濟市場。

(三) 政治過程

任何的政策的形成或改變，必定涉及政治過程，通產省想要推動其產業政策，便必須獲得來自產業界的支持，以及在民主政治制度民選政客的同意。而這便涉及官僚、政客和產業界間的三角關係。政治過程論強調描繪其中各種行為具所有的能力、資源，相互之間的合作或對立關係，以及如何結盟，以促成產業政策的順利執行(中野實, 1992)。因此，政治過程論強論政策決策、實行的「機會之窗」。在政治過程中，有許多的行為者如政客、官僚、利益團體（在日本被通稱為財界），三者間的合縱連橫，決定日本的政策產出。日本研究中的「鐵三角模式」，即以此為基礎，但不同學者卻有截然相反的主張，如一派認為政官財合作主導政府決策(蔡增家 2007: 4)，另一派則認為政官財間有「政怕財、財怕官、官怕政」的特性(奧村宏, 1983)。然而，這些行為者間的關係並非絕對相斥：若非合作，便是競爭。如有學者認為，太多的既得利益團體相互之間的否決(mutual veto)，使日本在 1990 年代政經改革沒有太大成效(Lincoln, 2001)。

其次，通產省在推動產業政策時，經常運用金融和財政資源，但必須面對主管金融和財政的為大藏省，通產省必須與之在政策推動上相互協調，特別在利用政策性銀行提供低利貸款，以及稅務減免誘因上，都直接涉及大藏省的管轄權。大藏省因掌握金融和財政權，向來被認為是日本政府機構中權力最有權勢者大者，即使其在 2001 年後更為為財務省，將金融管理權完全分出，僅主管財政權，仍然負責財政和稅務，同時仍然掌管號稱第二財預算的「財政投融资」，通產省主管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或其他政策推動仍然需要財務省的支持。本研究在分析時，將特別著重通產省和大藏省間的政策協調。如此，政策過程論的討論，將不只是政、官、財三種角色而已，而是三種類型行為者，在同類之間也不同的利益的行為者。政策過程論有助我們留心觀照政策過程場域中，各種不同行為者的互動。而 2009 年 8 月後，民主黨執政，政、官、財間的關係，也將有所改變，更透過比較自民黨執政和民主執政期間，產業政策在目標、工具、執行上的差異，研究日本產業政策是否因為政界變化而變化的良好時刻。

(四) 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在全球化與國家變遷的研究中，有兩派爭鋒相對。一是「趨同論」(Convergence School)，認為全球化會使各種不同類型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趨向轉型為英美式的自由主義市場，即所謂的「監理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其原因可能一方面來自美國強力推動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則是該種體制較適應全新的全球化經濟時代(Jayasuriya, 2005)。但另一派「歧異論」(Diversity School)或「多樣性論」(Varieties School)則強調各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政經體制，會因為歷史發展(Yamamura and Streeck, 2003)、制度間的相互配合(Hall and Soskice, 2001)，而較難以趨同，反而仍然會保有特定的國家特色。如日本和德國雖然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所謂的「非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nonliberal capitalism)、或「萊茵模式」(Rhine model)，兩者雖有些共同的歷史發展如工業發展、經濟自由化先於政治主化，以及強調特定團體權利先於一般大眾權利的保守改革，但兩者還有相當多的不同，如德國以職業團體自治為主的、日本則以企業系列自治為主，使得兩者的資本主義有所差別(Streeck and Yamamura 2001)，諱論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模式和非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模式間的差別。「趨同論」和「歧異論」的爭論凸顯對日本政經變遷的研究，更具有理論貢獻意涵。本研究援引資本主義多樣性的討論，由歷史發展、歷史制度分析出發，建構比較個案的基礎，再透過分析通產省的轉向和產業政策改變中，檢證此兩種理論觀點。

二、研究方法

過去對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爭議焦點集中在，是國家主導或是市場主導，而使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然而，隨著日本經濟已日漸成熟，1970 年代後，企業無論在財務、管理專業上都已獨立自主，在經濟官僚前不再弱勢，也對通產省的行政指導開始有意見。1980 年代的通產經濟官僚在民選政治家、壯大的企業家之前，於是相對開始弱勢，其所享有的政策獨立性便不再如 Johnson 所描述的高，連帶也使其產業政策的決策、實施和效果不如預期。通產省開如反省過去的保護主義式產業政策，開始進行開放進口市場，減少關稅和非關稅障礙等經濟自由化措施。而通產省的「行政指導」也在 1994 年因為國會通過「行政程序法」要求官僚行政必須明文、透明，使得行政指導經常面臨違法之虞。在此情況下，又可以觀察到通產省原有政策工具和執行能力，其實愈來愈受到挑戰。以至於通產省在 1980 年代提出的促進大形積體電路研究、發展日本式電腦的產業政策，被批評為失敗。通產省面對自己提出的產業政策執行出現問題，通產省徹底反思日本政經結構是否發生變化，以致原有的產業政策失去效用。

首先，本計畫的研究設計採取結合個案研究法和比較研究法的比較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可以深入呈現、分析個案的時空脈絡，便於分析其中的結構和行為者間的策略互動關係，可作為進一步提出理論的基礎。但個案研究常會因為特定的個案而有不同的推論，因而造成理論建立的困難。比較政治中的個案取向比較研究(case-oriented comparative method)則透過比較個案，增加個案數而不致於形成不同的推論(Ragin, 1987: 34-68)。至於另外一個個案研究可能出現的「案例少、變數多」問題(many

variables, small number, small N problem), Lijphart (1971: 685-691)認為可專注於「具有比較性」(comparable)的案例，並找出關鍵變數(key variables)來解決。因此，本研究採取 George and Bennett(2005)建議的「結構化、焦點化比較方法」(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其中「結構化」指針對比較的案例，施予同一系統性的問題以進行資料蒐集；「焦點性」則指只處理比較案例的某個層面，掃描重要變數以避免失焦。

因此，本研究計畫以日本通產省官僚及其負責的產業政策為研究標的，在研究設計上便符合「焦點性」的特徵。其次，本研究要選擇要比較的個案，選擇的標準是：一、通產省改變產業政策觀點和措施前後，針對同一產業有何不同的作法。二、在1994年行政程序法通過後，通產省的行政指導有何改變。依此標準，本研究至少便有兩組可作比較的個案。其次，本研究依此兩項標準，「結構化」地蒐集資料，進行訪談。因此，本研究在比較個案的差異上，即可採取「過程追蹤」方法論(process-tracing methodology)。此種方法在研究變遷時，追蹤由起初的情況到改變後情況之過程中的每個階段，所有涉及其中的行為者，而能夠清楚地掌握過程中的真實政治圖譜(Tiberghien, 2007: 27-28)。

其次，本研究資料的蒐集和取得採取訪談方方法和文獻蒐集法。由於研究標的是日本通產省官僚及其產業政策的變遷，本研究首先以文獻蒐集法累積相關的文件如通產省官僚的政策說帖、政策計畫、審議會會議紀錄、省廳通訊等。在產業方面則以日本經團連、產業出版的政策意見書、雜誌和通訊為主。而媒體如各類日文、英文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以及日本國內外研究單位出版或發布的書籍、報告書、討論論文等。這些文獻資料因是二手資料，本研究則以訪談個案中的重要關係人物、或參與其中者的口述訪談資料來加以補正。

伍、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以通產省負責的產業政策為研究焦點，探究通產省官僚和日本產業政策如何由發展主義轉向市場經濟主義，深入分析日本政經體制轉型中的官僚轉型層面。第一年計畫蒐集並累積有關日本通產省的各種文獻研究，以及相關的官方文畫資料，建立理論分析架構，尤其著重在期望發現1980-1990年代，通產省產業政策受到來自自民黨政客、產業界團體力量的干預，以致於成果不彰，甚至被否決的失敗案例，以及成功的案例。有了相對照的案例，便可透過比較失敗案例和成功案例的差異，分析其間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環境因素，進而探索通產省官僚為何改變對日本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產生疑問，如何改採英美式的市場開放、自由化的措施。

一、由發展主義到市場經濟主義

在1969年之前，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工具主要有產業合理化(要求業者整併)與外匯管理、減稅(折舊優惠等)、日本開發銀行融資和暫時卡特爾(cartel)准許等四個。不過，這些都在1960年代末期受到挑戰。首先外匯管理之權在1970年被取消。產業合理化在汽車業上受到三菱汽車反對而受挫，日本開發銀行的融資佔民間企業融資比例日小，以及卡特爾指定權因獨佔禁禁法(即公平交易法)修改而被取消，顯示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工具因法規改變、民間企業因經濟發展在財務、經營上日漸具有自主權，愈來愈難以引導企業朝向其所愈發展的方向。在這種情況下，通產省內部開始展開內部討論和爭辯，未來10年的日本經濟要何去何從，通產省又該如何因應。

1971年通產省企劃官兼大臣官方室長天谷直弘在通產省的產業構造審議委員會中首次公共提出日本產業政策必須典範轉移看法，認為在國際化和經濟統治權限縮下的情況下，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必須將日本置於國際中來思考，並提出有別於傳統勞力密集和資本密集兩種產業分類，發展新形態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構想。天谷的觀點後來成為通產省出版的「70年代的通商產業政策願景」一書之主軸。該書主要有三項主張：(一)由成長追求型的政策目標朝向成長活用型轉換：以往的政策思維是生產第一，但卻忽略成果的分配，必須轉而著重勞動環境改善、社會資本充實、營造良好環境、擴充教育、

增加研究開發投資、擴大國際協助支出。(二)重視市場機能：迄今輕視市場體制的調整機能是產業政策最根本的缺失，政府對企業可自主決定的領域恣意介入。今後應透過市場機構，在尊重民間自主性、通過競爭發揮創意和活力，期望達到資源分配的最佳化、利用的效率化、技術的革新等。(三)政府介入必須設定原則和規範：政府介入的原則是必要的最小限度(鶴田俊正、伊藤元重 2001:120)。

「70年代的通商產業政策願景」是通產省官方文件首次承認且強調市場運作的重要性。而發表政策願景也成為通產省每十年必為之事。通常是在每個年代的第1年，如1971、1981、1991。然而70年代願景在1970年代並未完全施行，主要原因是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迫使通產省必須果斷介入因應。但70年代願景在1981年出版的80年代願景中仍被認為是重要的，因此80年代願景一書便以「創造的知識密集化」延續先前的政策願景，且和先前政策措施不同的是，通產省已不再提出特定產業作為提振目標，而是全面性地推動所有產業的知識密集化。顯然，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在1980年代後已經和先前的干預主義、挑選特定產業的作法，有相當大的轉變(通商產業省產業政策局,1991:291)，產業政策的思維在1980年代開始傾向以開放市場的方式活用市場力量。

1997年通產省所屬的智庫通商產業研究所成立10年，對政府和市場間關係召開一場研討會，會後集結成《市場の役割 國家の役割》一書，揭示1997年後來通產省應有的產業政策理念是「市場和國家間是相互補充的關係，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政府的責任和機能是「擴張市場機能」，同時並減少「國家干預失敗」的可能(青木昌彥等編,1999:129)。此種相法和Gao(1997:9)描述之1965年前的發展主義著重「組織市場」的方向，有相當大的差別。我們可以發現，Gao研究的是1965年前日本產業政策的發展主義傾向，青木昌彥等人則指出1990年代後日本政府應有的產業政策基調是由「組織市場」到「擴張市場」。

二、比較案例與產業政策工具的轉變

通產省1980年代後已經開始轉變產業政策意向，但要落實在實際的政策作為中，必須考察實際的例子。1980年代是泡沫經濟的年代，也是日本企業實力最強，最具自信的時代。日本企業對通產省的產業政策如行政指導，有實力不願意配合，且通產省也公開其尊重民間企業，市場運作的基本政策立場。但面對著美日貿易摩擦，國內市場保護也因來自美國的壓力、歐美國家的保護主義抬頭而愈來愈受到挑戰。即使如此，通產省仍積極領導新一代產業的發展，如1970-80年代的高科技產業。但通產省的干預已經轉向給予企業較大自由度、比較間接的支助方式，如提供經費組織產業合作研發。一則因為企業本身已因經濟成長而茁壯，二來因為政府內部如通產省、郵政省(特別是民營化前的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文部省，科技廳等對高科技研發的方向意見不一，尤其是郵。第三則是，通產省對研發經費的投入因財政困難而日漸減少，這些都讓先前受到通產省扶持的日本電腦產業大廠如NEC，富士通都有更大的自主性，反而抗拒某些通產省的指示，進而導致數個通產省發動的研發案失敗。

1970年代後，通產省屢屢以提出政策建言、政策意向，引導民間企業追遁的作法使其成為所謂的「理念官廳」。這是通產省最常用也最不具有實質干預市場運作的政策方式。其次，若要介入市場，由前述案例上可見，通產省即使是以最低限度的市場干預，如提供研發經費、低利政策貸款，也無法達成其政策目標，迫使其必須重新思索產業政策實行是否有新的工具或方法。例如Anchoroguy(2000:403)即指出，這些失敗促使通產省採取開放本國市場保護政策，援引外國壓力迫使本國業者升級、改變。解除市場管制成為通產省致力的目標，如1994年大店法(大型連鎖店舖法)修改、酒類販賣開放、1995、96年電力能源業市場進入開放、1996年貨運業(陸運及空運業)及石油輸入業限制市場進入解除、1997修改獨佔禁止法第九條、2001。這些市場開放措施除了大店法和石油業是通產省所管之外，其餘都和其他省廳所管有所關係。通產省開放市場或解除管制的政策方式，必須尋求其他官廳的合作，以修改法規或法律。

由前述高科技產業和開放市場修法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瞭解日本通產省產業政策實行方法的轉

變，以及其成功和失敗的因素。這是本計劃第二年度的研究重點。

四、結論與建議

日本經濟奇蹟與通產省有密切關係，但在 1980 年代之代之後，少有國內外學者注意到通產省及其產業政策的改變。而它的改變並非忽然改變，而是漸進式的改變，其源頭甚至必須追溯至 1980 年代。二、通產省在 1990 年代構造改革時扮演的角色，少被學者、評論家提及，其構造改革的主張旨在打破原有的日本政經體制，並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作法，而這些作法如公司修改等，都對企業的經濟行為造成重大改變。三、通產省表面上看起來傾向英美式自由主義的立場，但在政策執行上，也仍然顧及產業的改造。唯有清楚地瞭解通產省的轉變，才能明瞭解日本政經構造轉型的核心。

參考文獻

中文

蔡增家，2007，《誰統治日本？經濟轉型之非正式制度分析》，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日文

三輪芳朗、J。マーク ラムザイヤー，2002，《産業政策論の誤解—高度成長の真実》，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大山耕輔，1996，《行政指導の政治経済学：産業政策の形成と実施》，東京：有斐閣。

中野實，1992，《現代日本の政策過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

村松岐夫、奥野正寛編，2002，《平成バブル研究》，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青木昌彦、奥野正寛、岡崎哲二編，1999，《市場の役割 國家の役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宮崎義一，1992，《複合不況：ポスト・バブル処方箋を求めて》，東京：中公新書。

通商産業省産業政策局編，1991，《2000年の産業構造》，東京：通商産業調査会。

野口悠紀雄，2002，《新版1940年体制：さらば戦時経済》，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堤和馬，2000，《巨大省庁天下り腐敗白書》，東京：講談社。

奥村宏，1983，《法人資本主義》，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鶴田俊正, and 伊藤元重，2001，《日本産業構造論》，東京：NTT出版。

榊原英資、野口悠紀雄，1977，《大蔵省・日銀王朝の分析：総力戦経済体制の終焉》，《中央公論》，八月號，頁96-149。

英文

Amyx, Jennifer. 2003.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the Bank of Japan at the Crossroads." In *Japanese Governance: Beyond Japan Inc.*, ed. J. Amyx and P. Drysdale.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55-76.

Anchordogry, Marie. 2005. *Reprogramming Japan: The High Tech Crisis under 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ao, Bai. 2001.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George, Alexander L., and Andrew Bennett.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IT Press.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tcher, Peter A. 1998. *The Ministry: How Japan's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Endangers Market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Jayasuriya, Kanishka. 2005. "Beyond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From the Developmental to the Regulatory State." *New Political Economy* 10 (3): 381-7.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atz, Richard. 1998.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Miracle*. Armonk, N.Y.: M.E. Sharpe.

Katz, Richard. 2003. *Japanese Phoenix: The Long Load to Economy Revival*. Armonk, N.Y.: M.E. Sharpe.

Laurence, Henry. 2001. *Money Rules: The New Politics of Finance in Britain an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 682-98.
- Lincoln, Edward J. 2001. *Arthritic Japan: the Slow Pace of Economic Refor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incoln, James R., and Michael L. Gerlach. 2004. *Japan's Network Economy: Structur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wa, Yoshiro, and Mark Ramseyer. 2006. *The Fable of the Keiretsu: Urban Legend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kimoto, Daniel I. 1989. *Between the MITI and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sen, Adam. 1998. *Restoring Japan's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Ragin, Charles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iberghien, Yves. 2007. *Entrepreneurial States: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emnt in France, Japan, and Kore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Usui, Richard A. Colignon and Chikako. 2003. *Amakudari: The Hidden Fabric of Japan's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rner, Richard A. 2003. *Princes of The Yen: Japan's Central Ban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 World-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mamura, Kozo, and Wolfgang Streeck, eds. 2003. *The End of Diversity? Prospects for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99年10月10日

計畫編號	NSC-98-2410-H-041-001		
計畫名稱	轉向：1980年代後日本通產省官僚和產業政策的變遷(I)		
出國人員姓名	林文斌	服務機構及職稱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	99年4月23日至 99年4月29日	出國地點	日本 東京

本人首先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核予經費，以及同意變更出國時間。以下依研究過程及日程安排、研究成果與建議等三項加以報告。

一、國外研究過程

本人原計畫安排 8-10 天進行訪問，但由於貴會僅核予新台幣 48000 元差旅費，扣除台北-東京來回機票費用，餘 32000 元依行政院出國差旅日支作業規定東京日 316 美元計算，約僅能停留 3 天，因此只能將行程縮減變更。但為使研究進行順利及訪談對象聯絡結果，本人仍然安排全程 7 天的訪問及蒐集研究相關資料行程，餘 4 天旅費則自行付擔。以下報告 4 月 23 日、4 月 26-29 日主要的研究過程。

(一)4月23日，星期五

上午至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華航 06:00 接駁班機至桃園機場，再轉搭 08:45 華航國際航班前往日本，於 12:55 抵達東京成田機場，之後再轉搭火車和地鐵，約於 14:30 入推東京市區內的商務旅店。稍事休息後，先以電話聯絡預定約訪的三位日本政府經濟產業省官員以及一位東京大學教授，再次作最後的約訪行程確定。但四位約訪對象若不是未接聽，便是不在座位上，只好以語音信箱留言，或請其同事代為轉達。之後為再保險起見，再發達電子郵件，告知本人已經抵日，預計在下週一開如進行訪談。直到 18:00 時之後，才陸續接獲約訪對象回覆確定。

(二)4月26日，星期一

上午 10 時約訪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准教授內山融。地點為內山教授研究室。內山融教授為東京大學前法學部長、前校長佐佐木毅教授的高足，曾任東京大學法學部助手，後取得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所博士，歷任該所助教授，於 2007 年升任准教授。內山教授在 1990-92(平成 2-5 年)曾任職於經濟產業省前身通商產業省，在經產省中有廣泛的人際網絡。

內山教授於 1998 年出版《現代日本の国家と市場》一書，討論及分析日本通產省由 1960-1990 之間在產業政策的轉變。他的主要觀點是通產省自 1970 年代之後有所謂的「市場的脫公的領域化」傾向，省內產生以最大限度的市場活化機制的主張。但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暫緩了這個呼聲，直到 1980 年代在自由化和民營化的風潮中才逐漸再有類似的看法出現。而在 1990 年代，通產中競爭促進的想法亦發增強，簡直變成市場自由化主張的旗手。不過，由內山教授該書的研究止於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並沒有發行新版。因此，本人擬訪談其對 1990 年代之後，通產省的產業政策有何更

進一步的變化。

本人採取半結構式的開放性問卷(請見本報告第四節其它)。但由於時間有限及訪談時的氣氛，並未依據問卷問題次序提問，而內山融教授為人也非常隨和，因此是以交換研究心得的輕鬆方式進行訪談。訪談約於中午 12 時結束。本人向內山教授請求是否允許本人進入藏書十分豐富的東京大學駒場校區圖書館。由於本人未帶台灣研究機構證件，該館原本允許，但經內山教授引薦和協調，破例該本人以外國護照證明進入。駒場校區圖書館設備新穎，藏書豐富，尤其設有以亞洲各國語言出版的多種學術期刊，是一大研究寶庫。

本人約在館內停留 3 小時，除整理訪談紀錄外，同時也翻閱、查詢，並影印相關研究材料。

(三)4 月 27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時約訪經濟產業省通商貿易局東北亞細亞課台灣・蒙古班(組)課長補佐(副課長)岡垣豐。訪談地點為東北亞細亞課相談室。岡垣副課長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大學(現併入大阪大學)俄羅斯語系，畢業後進入通產省服務，迄今已 21 年。於省內經產資源・能源廳、通產貿易局，並曾外派至台灣和中國大陸，擔任日台和日中貿易負責官員。

岡垣副課長為人和善、熱情，和一般印象中的日本官僚形象不同。通商貿易局類似台灣經濟部下的國際貿易局。通商貿易局內部係以全球區域劃分下屬單位，如歐洲部、美洲部、亞洲部等，部下再設置課，如台灣和蒙古、中國大陸屬東北亞細亞課。課中再以國家來區分相對應的班(組)。訪談時間約 2 個小時，因已屆午餐時間，岡垣副課長遂邀請本人至經產省附近餐廳用餐，繼續以輕鬆的方式訪談。

用餐後，約在下午 2 時許，徒步約半小時前往位於永田町的國會圖書館查詢相關資料。於圖書館內約停留 3 小時。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書豐富，地位類似台灣的中央圖書館，全日本圖書應有盡有，同時也因國會間的合作，而收有大量其他國家統計及研究等年報或資料，有許多是在台灣圖書館中難以發現的。

(四)4 月 28 日，星期三

上午 9 時約訪經濟產業省產業政策局產業組織課長奈須野太、課長補佐鮫島大幸。訪談地點為經產省 14 樓訪客相談室。此次約訪係透過內山融教授引薦，特此致謝。奈須野課長和鮫島副課長都是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畢業後即考進通產省，是典型的日本菁英官僚，兩位都曾被經產省甄選至美國進修企管碩士，是省內培育的未來高級官僚人材。

訪談中可以明顯體會到日本官僚對自己國家和省廳的自信和期許，同時也為使國家和社會朝向更高目標前進的強烈情感。課長層級(台灣稱為科長)看似不起眼，位階也不高，但日本的行政研究所謂「課長行政」一詞，形容眾多政府政策的發起點其實是由課長一級發起。由此可知課長一級在日本官僚中的重要性。全程訪談約 2 小時，不過，可惜的是，奈須野課長於訪談開始約 30 分鐘後，忽然表示臨時有重要會談必須參加而告退。本人雖感遺憾，但仍繼續訪談鮫島副課長。

訪談結束後已近午餐時間，用餐之後，再次前往東京大學駒場校區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並整理上午訪談紀錄，於館中停留約 3 小時。

(五)4 月 29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 check out 後，逕赴成田機場，搭乘 16:45 班機返回桃園。

二、研究成果

本節摘述 4 位訪談對象的訪談記錄概要。

(一)內山融

問：通產省在 80 年代之後有什麼改變嗎，是一直持續他 1998 年書中所說的脫市場化嗎？

答：內山教授認為是有持續的。此外，他認為，和其他省廳比較起來，通產省的資源和管制權力已經慢慢不見了。所以，它只好找其他的省廳在一些議題上合作，如 1990 年代的控股公司解禁，2000 年代的商法改革。而在行改革上，通產省也傾向開放。不過，內山教授也指出，通產省內部中也有自由主義和控制市場的兩股力量，前都以產業政策局為主，後者則是其他一些原局。但通常是政策局為主流，因為局長之後通常擔任次官。

問：通產省大藏省之間看似出現的自由和保守差異的原因為何？

答：內山教授認為，1990 年代，大藏省被批評保守，不願自由化，而通產省則傾向自由的可能原因。雖然意識形態很重要，如通產省會派官員去美國求學，智庫也都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在主導。但所管的產業結構的不同，大藏省的金融業是較對內的，外國競爭壓力較少，但通產省所管是製造業，是對外的，所以有自由貿易和國際競爭，以致於兩者有不同的表現。雖然這有如利益團體政治，但官僚會在其中作為一個過濾器。

(二)岡垣豐

問：通產省內是否在產業政策上有路線之爭？

答：省內長期有所謂的國內派和國際派之分，即產業局和通商局的爭議，特別在 1994 年有一個很大的衝突，因為國內派官僚連任四任常任次官，引起國際不滿。到現在為止，還是有國際派和國內派的區分。

問：國內派和國際派雖然有所爭議，但是否有合意之處？

答：1960-70 年代，如《官僚們的夏天》一書所說，日本必須自立，所以採取保護政策。但 1980 年之後，在美國壓力之下，也不得不開放，所以通產省也採取了開放。目前和其他省廳相比，經產省算是自由主義大本營，推動自由化的，如石油，電力能源，都以自由化來希望提升競爭的。而經產省雖會提出許多的建議，但好或不好，還是要和其他省廳協調，也特別要有政客的決定。而經產省對外主要採取自由主義，但也有保護之處，如在上游的原物料業就有要保護的必要，但下游的就不一定了，主要依市場競爭。

問：日本與其他國家洽簽 EPA- 經濟夥伴協定時，政府內的協調過程為何？

答：日本和東亞各國在談 FTA 時，國內也有調整的問題，如他們和農林水產省、財務省、外務省一起合作對外談判，但回來後，卻需要由更高層的官僚或政治家談。過程中有不斷的交易。若有企業反對呢？便需要用交易的手段了，如日本和泰國談 FTA 時，泰國要求紡織公司如東 三菱紡，必需技術輸出。他們便去和企業談，如給予租稅上優惠。對已經去當去投資的企業好處比較多。

問：既然是稅相關，那和財務省的關係如何？

答：基本上是只能向他們提起建議，接不接受在他們，例如經產省寫了許多的建議報告，都和各省廳有關的。不過，和特定部門的會有好的合作關係，如財務省的貿易保險公司，是和貿易有關的。當省和省之間無法解決時，有兩個管道，一是由政治家去談了，因為 FTA 涉及的不只是省，還包括地方相關產業，如農林業，如此便需 對外來的壓力。第二管道是，省間的次官會議，可以調整，但現在民主黨政權，將次官會議廢掉，便失去了調整的機制。現在官僚間的衝突幾乎沒有調整的制度和形式。官僚對民主黨的統治，也很困擾的。

問：關於新能源政策，日本的進展如何？

答：日本在 2004 年之前，經產省曾大力推動新能源，新節能產業，但在 2004 年被財務省的預算編列時，被評為當無表現，稅的優惠也就沒了。此時如京瓷等的技術還在世界二、三，但今年後再開始時，已經落後到世界七或八名了。優惠稅率是最有成效的，

問：中國經濟市場對日本的影響？

答：中國是要去的，如一些勞力密集產業，但若該產業對日本經濟有重大影響，也要符合日本利益，經產省一定會主動協助，但如果沒有的話，便在其他方向有所不幫忙。

(三) 奈須野太、鮫島大幸

問：經產省為推動公司法制改革？

答：1990年代，日本經濟急轉直下，經產省必須要做什麼，雖然有人批評經產無用論，但他們在1990年代，確實在推動構造改革的。如這些法制原本就是法務省管，但他們認為，尤其在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後，經產省沒有大多的預算可以激經濟，從法上的變革，是可以的，而且是不用花錢，只要改革便能達到的。所以，才會努力去做。從1990年初開始，通產省便屢向法務省建言，但直到與謝野馨擔任通產大臣時才大力推動。通產省還為此派了兩個人「出向」到法務省。這是很罕見的事。

問：為何找法務省合作？如何推動？

答：法務省和法界，政界人士關係良好，獲得讓省支持，也就得了支持。而經產省也會透過政界如透過個別議員在國會中提案，但這種情況較少見。經產省並不怕找政客幫忙，而他們也和經團連關係良好，但現在的民主黨政權的支持基礎是中小企業為主的日本商工會議，和勞連，所以和他們比較不熟。

問：1999年的行政程序法執行對官僚行政有何影響？

答：並沒有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他們還是常他電話要企業提供資料，或去拜訪，幾乎是沒有拒絕的。而他們也會「很有禮地說」。

問：經產省目前認為較有用的產業政策工具為何？

答：減稅和租稅特別措置是很有工作政策工具，但經產省和財務省間在這有時會有衝突，如減稅，即減少政策收入，經產省必須提出相對收入以補不足。不過，兩省對日本經濟應如何倒是有一致的見解，如必須減省國債。雖然我說目前並不會有問題，因為是日本的大銀行在持有，但他說，難保未來幾年會這樣。近來他們正在推動法人稅下降，但受到財務省的反對，不過因為公平會大臣和國家戰略局長官枝野幸男是同情他們的，所以也就不需要有大動作，目前日本法人稅高達40%，其中10%給地方政府，和韓中美比，太高了。

而他們也擔心日本企業在國際競爭力的下降，極力促進企業的合併，但首先便須經過公平會的同意。如此，經產省一方便要想競進市場機制，一方面又想要有一個大企業好可以同他國競爭（韓國，中國），他的說法是兩者不矛盾，經產省請公平會以全球世界為考量，實際上便沒有所謂的減損競爭的問題。外國提供多少優惠給企業，他們也應該要，且要更多。有時候要保護，有時候便要促進競爭。

問：日本的能源產業如何促進？

答：經產省的立場是，促進新產業他們還是採取間接的做法，便是抵稅，如研發可以抵稅，但若以貸款，雖然利率低，但企業還是付出成本的。且有失敗風險，失敗時便無法回收。

問：民主黨政權對官僚行政的影響。

答：次官會議廢除，使省廳間的協調缺少一個管道，對官僚而言是件不好的事。而民主黨想要樣樣自己來，也懷疑官僚，例如，若提供資料給在野，必須寫報告給長官。

三、建議

本研究計劃的進行，十分著重出國訪談和日文資料蒐集。但因受限於旅費限制，無法停留更長時間，對於研究訪談安排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經過一再的事前聯繫和協調，最後才敲定四位訪談對象。所幸，此次約訪對象也都能如期撥冗接受本人訪談。感謝貴會及計畫審查委員對次期

計劃中的訪談經費，考慮其對研究的貢獻，已予以核准。

四、其他

本次執行出國研究訪談，訪談問卷請見(一)所示。而在訪談時，也獲得日本經濟產業省官員非常慷慨地贈予該省相關內部參考資料。資料名稱如(二)所示。進入經濟產業省辦公廳舍時須登記並領取臨時通行證，如(三)所示，再刷證感應進行。離開時則必須再刷證感應繳回。

(一)本次出國訪談的問卷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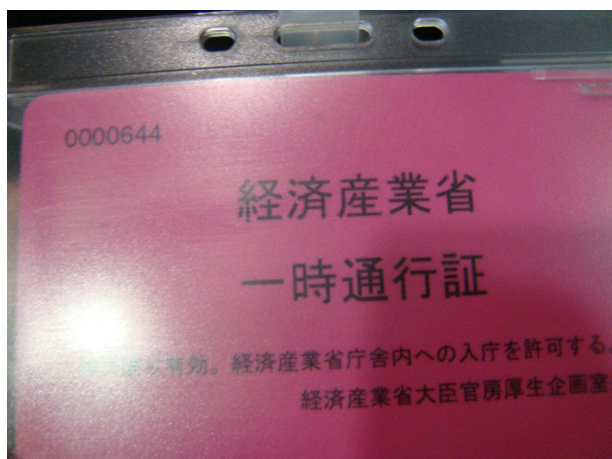
The main theme of my interview focuses on the “turn around” of MITI’s industrial policies:

- The first is how MITI’s economic ideology transits to market/economic liberalism from post-war’s developmentalism; is any case indicating this changing?
- The second is the interactions, bargains, even constrained interdependence among MITI bureaucrats and other actors, such as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men, other ministri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Is any case indicating this changing?
- The third is that are there some specific cases could show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MITI/METI's policies? Why and how?
- The fourth is that does MITI/METI play any role during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an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商法改革)?
- The fifth is that does the law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which became active in 1999 constrain MITI/METI's policy implementing?
- The sixth is that while Japanese economic getting down in early 1990s, what are point of view about and polices to fight for reviving?
- The seventh is that is any case to show some disagreements ,even struggles between METI and MOF, or other ministries about METI's industrial policies? Why and How?
- The final is that the Japanese energy policy about saving energy, new power innovating interested me.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that.(I have read some articles in the METI Journal).

(二)出國訪問攜回資料

- 1.日本の能源政策，80頁。
- 2.經濟連攜協定(EPA)・自由貿易協定(FTA)とは，經產省內部簡報資料，40頁。
- 3.新成長戰略(基本方針)，經產省內部簡報資料，30頁。
- 4.平成22年度資源・エネルギー一關連預算案概要，經產省內部資料，16頁。
- 5.企業法制改革，經產省內部簡報資料，20頁。

(三)經產省臨時通行證



無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文斌		計畫編號：98-2410-H-041-001-						
計畫名稱：轉向：1980 年代後日本通產省官僚和產業政策的變遷(I)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3	3	100%		2010/6 佛光大學政治學系主辦-政治與資訊學術研討會 2010/11 中國政治學會 2010 年學術研討會- 2010/11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首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1	1	100%	人次	兼任助理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計劃發現 1980 年代之後即開始改變，由發展主義轉變為市場促進主義。其學術價值在於當政學界都認知到日本經濟奇蹟與通產省有密切關係，但在 1980 年代之後，少有國內外學者注意到通產省及其產業政策的改變。其所代表的意義是：一、產業政策的改變的並非忽然改變，而是漸進式的改變，其中涉及國際政經環境和國內經濟發展階段等影響政府產業政策意向和工具轉變。二、通產省在 1990 年代構造改革時扮演的角色，少被學者、評論家提及，其構造改革的主張旨在打破原有的日本政經體制，並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作法，而這些作法如公司修改等，都對企業的經濟行為造成重大改變。三、通產省表面上看起來傾向英美式自由主義的立場，但在政策執行上，也仍然顧及產業的改造。唯有清楚地瞭解通產省的轉變，才能明瞭解日本政經構造轉型的核心，本計劃也能基於前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發展比較政治經濟學中的政經發展模式比較。

本計劃已完成第一年計劃深入瞭解 1980 年代前後，日本通產省產業政策轉變的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脈絡和比較案例挑選。第二年計劃將進一步進行案例比較，並計劃在當中完成期刊投稿論文初稿，在第二年計劃完成後，完成學術專書。